

我与新时代

林毅夫：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祝伟

在许多人看来，如今70多岁的林毅夫已经“功成名就”，但他依然活跃在学术研究一线，从未停止对中国发展的思考，甚至还在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讲台上一站就是2个小时。

曾经做了他20多年工作助手的陈曦说，林毅夫每天的日程表上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从润园那间办公室的灯仿佛一直亮着，“如果一定要问林老师有什么爱好，工作算不算？”

“家国情怀，严谨治学，和而不同，谦谦君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用这16个字概括了这位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

经济学家有责任去研究和回答时代议题

推开林毅夫办公室的门，一整面墙的书架映入眼帘。除了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书架上摆放的不同时期的老照片，勾勒出这些年来他的心之所向、行之所至。

林毅夫不止一次提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北大是重要的地理坐标，是他经济学研究起步的地方。1979年秋天，20多岁的林毅夫进入北大经济学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他日后创立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1982年，在北大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林毅夫远赴美国，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关门弟子。在芝加哥大学，林毅夫将中国农村改革作为研究方向。他早期的学术成果，大都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林毅夫笑称，尽管早已“农转非”了，但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将他视为一位“农业经济学家”。

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农”问题？林毅夫说，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什么能给中国带来如此深刻的改变？这背后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这是当时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经济学家，有责任去研究和回答这些时代议题。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4年，林毅夫受益良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尽管这与“芝加哥学派”单纯强调市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正是从那些经

济学大师身上，他学会了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来观察和总结真实世界现象背后因果逻辑的方法。

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林毅夫所坚持的方法论。“他特别反对碰到一个现象就直接试图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而是主张以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去研究问题。这样得到的解释可能与现有的理论解释一样，也可能与现有的理论解释不一样，如果不一样就可能形成一个新的理论。”黄益平说。

真正原创性的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解上

1987年，林毅夫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

与那个年代放弃海外高薪和优越条件的归国学者一样，彼时，林毅夫也面临许多选择，不少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向他抛出橄榄枝，有的甚至“3天工资就是国内1年的收入”。当得知他要回国的决定时，身边的许多老师和朋友都非常不解。他们劝林毅夫，在当时的中国，连最新的学术文献都查不到，如何做研究？

林毅夫回答，真正原创性的理论不是来自于文献，而是建立在对现实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许多重大的经济现象都发生在中国，如果不在中国本土研究这些问题，那就是雾里看花。

回国之初，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向他发出了邀请。在那里，林毅夫和他的同事一起跑遍了我国最偏远的农村，热热闹闹地参与了当时我国农村的改革进程，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早期的著作《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然而，林毅夫始终对在中国建立一个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重镇、培养一批懂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年轻人念念不忘，希望成立一个面向海外回国经济学人的研究机构，“用中国的经验提出一套新的理论”。1994年8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林毅夫担任主任，海闻等人担任副主任。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吸引人才，是不是有人愿意从国外回来。”林毅夫回忆说，在当时相当长的时

间内，国内海归经济学家只有他1人，一直到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才增加到6人。“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要发挥作用，需要一个全新的体制，新的体制能不能被接受？”

从创办之日起，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继承了北大兼容并蓄的传统。回忆起在林毅夫身边工作的经历，陈曦感慨说：“无论是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是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每个人都知道他开会的习惯，教授们可以畅所欲言，他对不同意见从不居高临下搞一言堂，总是以理服人，一直谈到你心服口服。”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及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几乎参与了中国每一次重要改革进程的讨论，从早期的农村土地改革到国企改革，再到医疗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人们所熟知的诸多改革，都能在这里找到学术的“底本”。

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优秀改革先锋称号，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林毅夫入选。

“他把自己所学与国家所需结合起来，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长期与林毅夫在全国政协履职的会计审计专家张连起如此评价他。

用中国经济理论解释中国创新实践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关注。2008年6月，他成为世界银行成立以来，首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林毅夫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任职的经济学家很多都毕业于欧美知名大学，对帮助发展中国家也抱有很高热情。可是当他们到非洲一个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人口不到1000万的小国考察时，给出的建议却是与发达国家一样发展股票市场、风险资本。

“思路决定出路”，林毅夫说，如果把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理论简单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即便政策初衷很好，但效果可能不及预期。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关键是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去寻找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2012年6月，结束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期之后，林毅夫回国，重新站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普通的北大教授。

这些年来，林毅夫一直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是他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总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的新理论，力图为中国探索一条经济发展新路。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学者向世界表明中国立场、阐释中国道路、发出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林毅夫说，“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作用，发掘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

因为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潜力，有人给林毅夫贴上了“乐观派”的标签。对此，林毅夫并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学术观点，别人接受最好，批评也很正常。我追求的并不是别人说我好还是不好，我更多关心的是能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真正有所贡献”。

尽管担任多个社会职务，但林毅夫最看重的还是北大教授的身份。从1995年开始，他就给北大本科生开设“中国经济专题”的大班课，除了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外，20多年来从未中断。2020年，林毅夫又领衔创办了“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这个班也被称为“林毅夫班”，希望为中国培养出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和引领世界思潮的拔尖人才。

曾经在“林毅夫班”就读的学生吴梦说，哪怕只有一个学分的课程，林毅夫也会认真对待。每个月无论有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与学生们交流，一起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从宏大的经济议题到身边的寻常小事，无所不包。

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表达过对教书育人这件事的喜悦，“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一大快乐”。他随之也会告诉学生：“作为天下的英才，是要对天下负起责任的，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一如他在北大毕业典礼上对学生的寄语：“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

林毅夫说，这也是他自己内心的信仰，40多年来从未改变。



灯火初上的北京大学。（视觉中国）

推大师说

中国过去4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同时，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和部署也不断与时俱进。中国过去70多年的发展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大差异，而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走了自己的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需要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道理。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一般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没有结构内生性的概念，而是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作为最优结构，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发展目标。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就要求在理论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构特性的差异，并了解内生性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

奇迹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如果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看中国，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放慢一点，国际学界、舆论界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但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创造了奇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需要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道理。

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新结构经济学倡导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与影响。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的，每一个时点上要素禀赋给定，这些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在某一发展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合合适的基础设施与一定的制度安排，便转化为一国的竞争优势产业，这种发展结构便是最好的结构。

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与现代经济学相结合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结构与结构间的关系。为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第一代的结构主义，我将它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

正如我在《中国经济的前景》一书中提到的，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除了必须有严谨的数理逻辑模型，还要通过扎实的宏观和微观经验数据来了解现象以及检验各种理论假说。展望未来，我们当不辜负这个时代给予的机遇，对理论的发展作出创新性的贡献。而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较为相近，与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相比，来自中国的理论也能够比较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繁荣富足的目标。

林毅夫



北京大学未名湖与博雅塔风景。（视觉中国）

□ 万建民

生活中的经济学

商场电梯有玄机

逛商场多了，发现商场里的电梯设计有不少玄机。

在一些老式百货商场，自动扶梯往往不能连续换乘，而是要绕一圈才能继续上下楼，非常不方便。而在交通换乘枢纽、医院等人流密集的场所，自动扶梯一般都可以连续换乘。这其实是商场的“心机”：顾客要上楼，“强制”绕一圈，顺路多看几眼，说不定就能多做成一笔生意。商场要对商户负责，通过动线设计引导顾客到达尽量多的商铺，似乎也无可厚非。

不过在一些新建的商业综合体，你会发现自动扶梯大都可以连续换乘了，许多商场的电梯造型甚至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比如有中庭的商场，在扶梯上一般可以俯瞰漂亮的中庭；有的商场建了超长的跨层扶梯，方便人们快速到达高层；还有的商场定制了造型别致的螺旋式扶梯，成为网红打卡点。这些自动扶梯不仅上下方便迅速，而且视野开阔，商铺在电梯上一览无余，自然不需要

“强制”引导消费者绕了一圈了。

当然，电梯设计是个专业活，首先受制于建筑物的物理条件。老式的百货商场受楼体结构局限，电梯设计的发挥空间非常小。商场是出租空间的，电梯占用的空间越大，用来出租的空间就越小。在常见的自动扶梯布局中，不能连续换乘的布局是最省空间的。老式商场大都选用这种布局，既节省了空间，又捎带手帮租户引了流，可是新建的商业综合体为什么不再选用了呢？

答案是消费者不愿意了。以前逛商场，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消遣，在无目的的闲逛中，多转几圈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现在，很多人去商场都是直奔目标而去，比如位于高层的餐饮，主流的消费习惯变成吃完饭顺带逛商场。需要绕一圈才能继续上楼的扶梯越来越受诟病，商场自然要作出改变。

通过动线设计科学引流、分流，是商业空间设计时的必修课。对于商场来说，“客流即是现金流”，大门将消费者引入商场后，

扶梯就承担了在垂直动线上对消费者进行引导的职责。传统百货商场越往上客流量越小，所以一般不会超过六层。随着业态的更新和消费习惯的变化，餐饮逐渐成为商场流量的重要来源，很多商场把直梯搬到了更加醒目的地方，外墙广告上餐饮的招牌也占了最大的位置，这同样是出于引流考虑。

除了电梯这一垂直动线，商场在水平动线上的规划也费尽心思。比如具有天然引流效应的知名品牌旗舰店，作为商场的主力店，总是被精心地分散布局，它们不仅作为主动线上重要的节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用以吸引消费者“路过”更多商铺。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动线设计一定要保证易达性，也就是不能一味为了引流，而给消费者设置过多“障碍”，处处都要“绕一圈”。在所有的营销和运营手段中，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小心机”终究会被消费者识破。但如果商家能够深入研究消费者的动线，并做一些空间设计和货品展陈上的改

进，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可口可乐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作“放在红牛的右边”。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推出了一款功能性饮料，公司给零售终端业务员的指引是：放到红牛的右边，并且保持与红牛同样的排面数、同样的价格。为什么要与红牛放在一起呢？因为提到功能性饮料，消费者首先就会想到红牛，与红牛放在一起，就等于告诉消费者这款新产品的功能。为什么要放在红牛的右边呢？因为大部分人习惯用右手去拿货架上的产品，很多消费者最初是冲着红牛去的，结果出门的时候却拿了可口可乐的这款功能性饮料。仅仅因为这个陈列顺序，这款新产品就提升了13%的销量。

很多时候，魔鬼和天使都藏在细节里面。一个细节，不一定能决定成败；一连串细节叠加起来，一定会形成巨大的能量。聪明的商家，不应该忽视任何一个细节。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姚亚宁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fukan@jijbs.cn